



學林春秋

二编 上册

张世林 编

朝華出版社

学林春秋

二编

上册

张世林
编

朝华出版社

学林春秋

二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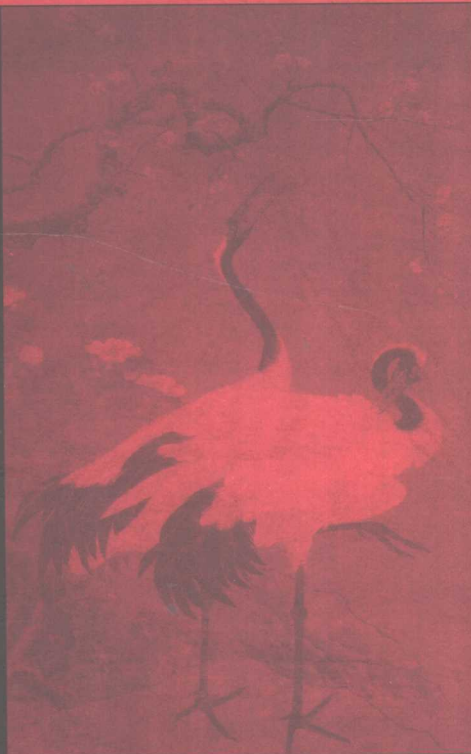
下 册

张世林
编

朝华出版社

學林春秋

二編
上冊



學林春秋

二編
下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林春秋:初编、二编、三编/张世林编.

-北京:朝华出版社,1999

ISBN 7-5054-0639-6

I.学… II.张… III.社会科学-研究-文集 IV.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1421 号

学林春秋二编(全二册)

张世林 编

朝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100044

北京通州区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21.5 印张 494 千字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定价:48.00 元

ISBN 7-5054-0639-6/G·0189

如发现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退换

2000.2.2

三联韬奋图书中心

No. 4195625

卷 首 语

干工作有时会上瘾，特别是当你被自己编织的理想所罩住，心中的憧憬十分强烈的时候。我编《学林春秋》这套书的感受就是如此。最初，我负责编《书品》杂志时，听到读者对杨伯峻先生写的《我和〈左传〉》一文很感兴趣，颇受启发，很想多组织一些老先生撰写介绍自己研治学术的心得体会的文章，隔三差五地刊发出来，既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又能解决缺好稿子的问题，这完全是出于编刊工作的考虑。但后来这项工作虽未能真正做下去，可又总装在我的心里。其后，隔上一段时间，便会听到一些熟识的老先生辞世的消息，每一次都给我以强烈的刺激，怅然若失，深为没能请他们把宝贵的治学经验总结下来而感到惋惜。同时，心里有一种欲望，一种冲动，更觉得是一种责任，应该赶快动手，把还健在的老先生们的宝贵的治学经验抢救下来。否则，就真的来不及了，那可是我们民族的损失啊！而且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有了认识，接下来就该有所思考，有所行动了。我确实是这样做的。首先我想到应该从健在的老一辈著名的专家学者做起，先请他们把自己宝贵的治学经验总结并记录下来，以免悔之晚矣。不知跑了多少路，写了多少封信，打了多少次电话，总算催来了四

十篇文章。这些老先生的年龄绝大多数都在八十岁以上。经过编辑加工,以《学林春秋》为名,将书发排了。按说做到这儿,我本该可以喘口气了。但我的脑子偏偏不肯停下来,我在想,编这部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固然是为了把这批老先生们的宝贵的治学经验及时地抢救下来,为后人治学提供借鉴和帮助。同时,正值 20 世纪即将过去,正应该对本世纪的中国学术史加以总结。既然如此,便应该重新制定规划。在 20 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上,除了上面那批老先生以外,现在年龄在六十以上八十以下的这批学者,也应该及时地加以总结,因为他们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为 20 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同样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要是能把他们中的著名的专家学者的治学经验和体会一并及时地记录下来,庶几总结 20 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时,便可以留下一批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了。

这样一想,我又被自己所描绘的前景深深地吸引住了,于是乎,忘记了疲劳,忘记了艰辛,又开始了新一轮竞赛。既然是总结 20 世纪中国的学术史,就应该在 2000 年新的世纪到来之前出版,剩下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了,但工作量肯定要比前面大多了。

怎么办?说干就干!好在是个人的认识,个人的行为,不用向别人请示和汇报,当然也不能耽误本职工作。好在有了前面那编的工作经验,思路、体例、要求一仍其旧,只是先要确定下来撰稿人的名单,这可是最重要的一环,也是颇费周章的。我先根据自己对学术界的了解,将年龄限制在六十岁以上(含六十岁),开列了一个名单,然后再去征询一些先生们的意见,由他们提出一些补充,最后便按照这张名单,结合每位先生的治学所长,拟定文章的题目。做好以后,便开始具体的联系组稿工作了。基本上还是老办法,外地的采取函约的方式,本地的则多为登门拜访,当面约稿。名单上一共有九十多位。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况且他们可都是大名鼎鼎

鼎的学者,教学、科研和社会活动是很多的,不是为我一个人服务的。但不管怎么说,我反正是该去跑的都跑了,该去信的都去信了。多数先生对我的这一想法很赞赏,亦很支持,都答应写稿,但能不能按时交稿,则还要靠催。还有一些先生,他们确实太忙了,打电话找不到人,写信去没时间回,最后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也答应写稿了,却迟迟交不来稿。每逢遇到这种情况,就要比谁执着和坚定了。这对一个编辑的组稿能力也是一个考验。我以为做这件事主要是为了给广大的青年学人在如何治学上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同时也是为了更切实地总结 20 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这么堂而皇之的理想和抱负,只能使我更加执着和坚定。于是乎,我便使出了做编辑应该具备的“精诚所至”式的催稿本领,不厌其烦地打电话或写信去催稿。已说不清打了多少个电话,写了多少封信了。冯其庸先生很支持我的想法,可他事务缠身,社会活动太多,血压还高,虽答应写稿,却一直没交来稿子。按说我对冯先生的处境是了解的,不应该再催促了。况且,我已经催过了,可谓尽心了。但我不这么想,因为我只请冯先生一人写《我和〈红楼梦〉》,缺了这一篇,就少了一个方面啊!所以我总是过一段时间,便给冯先生打一个电话,有时虽只是问候先生的身体,但先生知道我的意图,只好放下其他事务,抱病先给我赶写出了《我与〈红楼梦〉》,总算赶上发排了。裘锡圭先生为人非常严谨,凡他答应的事是不会不办的。我是在 1998 年年底左右约先生写《我和古文字研究》的,他答应了,但一直没有写。第二年他说要去台湾讲学五个月,准备在那里动笔,写好后寄给我。我一直在等待。直等到先生都回到北京了,还是没收到。我忙去看望先生,师母告诉我,去台湾前,没计划安排太多的课,本可以有时间写稿。但到了台湾后,许多大学慕名而来,非要请先生去讲课,结果安排得满满的,根本没时间写稿,只好

回来后再写了。其实回来后也不得其闲,又去香港、日本参加活动。我知道先生确实没有功夫,眼睛有病,还不能过于疲劳。但缺了先生的文章,我没法向学术界交待啊!只好硬着头皮,给先生打电话请安。最后先生又是开了夜车,把稿子给赶了出来。师母告诉我一直写到凌晨四五点才完。我真是于心不忍啊!李学勤先生应该说是举世公认的大忙人,特别是他自领导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以后,更是很难找到他。虽然他也是很早就答应给我写稿,我明知他不可能按时交稿,但也没有想到他会那么忙。我打电话,经常是他老伴接,告诉我在外面什么地方开会。要想找到先生委实不易,却经常在报纸或电视新闻上看到先生在外地的某一个考古工地上。先生确实太忙了,夏、商、周断代可是个大工程啊!为此他老伴劝我这次“放过”他。我却说,写学术回顾也是一个大工程,李先生也是非参加不可的,反过来请她帮我催着点儿先生。就这样,先生总算抓时间把稿子写完寄给了我,不过,不是从本市,也不是从外地,而是从美国直接寄给我的。先生是利用去美国参观访问的机会才忙里偷闲给我写出来的。田余庆先生的文章是最后一个交给我的,交稿的时候,全书都已经看完一校要出二校样了。原来,我最早当面约先生时,他是答应写的,但一来先生非常谨慎认真,二来血压一直很高,身体承受不了,所以又说不能写了。虽然我为此又是写信,又是打电话,又是去拜访,不想放弃,但考虑到先生的身体情况,加之时间也很紧了,只好先放下了。但由于田先生在史学界中的地位和影响,有些已经写稿的人或了解先生的人,总要问我:“田先生写了没有?”如徐苹芳先生,就不止一次地问过我,说一定要让田先生写,他不写可不成。其实我也知道不成,并把这些话及时带给了先生,但先生还是婉辞。这之后,徐先生去台湾讲学五个多月,回来后又问起这件事,当时稿子都已经下厂排字去

了。经徐先生这么一问,加之我本来也不甘心,于是又去田先生府上拜访,旧话重提,并告之,不答应则无法向学术界和读者交待。先生见我又来了,知道拗不过我,只好答应了。等我拿到稿子后,赶紧插入已排出的校样中,我长期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

当然,也有的先生不吃我这一套,最终是我拗不过人家,只好放弃了。比如蔡美彪先生,本想请先生写《我和中国通史》,无奈先生谦虚得很,怎么也不同意。再有姜伯勤先生,先是去信约稿,后又多次打电话,但也是一直未允。今年3月份,开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在北京见到先生,我又当面请他写稿,但先生是坚辞不允,我也只好屈从了。楼宇烈先生,我也是当面约的稿,本以为和先生挺熟的,殊不知先生不肯写,虽再三拜访、电话、写信,终是未果。另外,还有一些先生,由于各种原因,也未能写稿,如叶朗先生、袁世硕先生、刘家 and 先生等,虽不情愿,终无可奈何矣!于是,我想编书也和其他艺术一样,总是会有一些遗憾的,追求圆满,也只能是我们的一种理想。

不过,经过我这一番艰辛的劳作,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总算催回了八十多篇文章,厚厚的一摞,近一百万字。接下来就是编辑加工了,每一篇文章都要认真地看一遍,遇有弄不明白的地方,还要打电话向作者询问,还要搞清楚每一位作者的出生年月日,以便按年龄先后排定次序,最后,将四十一位七十岁以上的学者的文章编为《二编》,余下的四十三位六十岁以上的学者的文章编为《三编》,加之经过增订后,《初编》所收年龄在八十岁以上的学者的文章达四十四篇,三编合计共收文一百二十八篇,总字数为一百五十多万。为了能够在2000年以前将这三编保质保量地一齐推出,我和该书的责任编辑李占领兄,真是用了革命加拼命的办法,为了能够保证质量,尽量减少错别字,我们在每次校样经校对人员校过之

后,一分为二,各再通校一次,一共看了两遍,第三校时,又互换校样,再通读一次。在这一段时间,每天下班后,我和占领兄都要拿几篇校样回家晚上看,遇到星期六、日,更是要事先准备好要看的校样。这样,每天晚上都要看到很晚,直看到稿子都从手上掉下来。每个星期六、日上午,我都要送孩子去外面学习,孩子进了学校,我则跑到校外的一家小公园里,坐在大椅子上看校样,直看得浑身凉透,大有“箪食、瓢饮,回也不改其乐”之“信念”。不过,苦在其中,乐亦在其中矣!之所以能如此,我相信只要读者能认真读一读上述这些大学者们的文章,他们在人生和治学过程中经历过的千辛万苦,特别是政治上的迫害和压抑,才真叫人体会到说不出的苦啊!只有备尝艰辛而又努力奋斗的人,才能够成就大学问,大事业。他们每个人的经历都是最好的说明。相形之下,我们除了倍受鼓舞和激励,还能谈什么呢?不过,我还是要真诚地感谢占领兄,他为本书的出版,做了那么多具体、细致的实际工作,没有他那么认真负责,真不知要出多少错。

最后,我还要强调一下,主编这套书,完全是我个人的行为,虽然抓回了这一百多篇文章,但由于鄙人才疏学浅,加之孤陋寡闻,肯定漏掉了许多应该收入的有成就的学者,这个责任当然在我,希望知情的人能够多给我以批评和提示,好让我今后有机会加以改正并补就。

邓云乡先生和顾学颢先生,他们两位最先把稿子写好寄给了我,却先后因病故去了,未能看到本书的出版,在此,谨向他们致以深切的悼念。

张世林

写于1999年11月29日深夜

目 录

上 册

我和中国版本学 冀叔英 2

鉴别一书的版本,不止只分析辨别其刻版或抄写的年代,还应进一步熟悉某书历来传世有多少版本,现在某本稀见,某本流传尚多,某本由某本出,各个本子的异同优劣,辨其版刻源流。版本学的内容包括面是很广的,几乎每一种书都有其版本问题。

我与中国新石器研究 佟柱臣 11

中国新石器在世界新石器中的地位。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世界上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江西万年仙人洞,距今一万一、二千年,而西亚、日本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约当公元前八千年,越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约当公元前七千年,中亚新石器时代文化,约当公元前六千年。因此说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是当时世界上最早的新石器文化,也是最进步的文化。

我和宋史 徐 规 29

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必须练好三个方面的基本功。清代姚鼐说:“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这三者是史学家密不可分的必要修养,古今众多学者对

此的看法是一致的。我在多年治史的过程中,深感这一说法确为颠扑不破的真理,行之有效的指针。

我与考证学 祁龙威 43

我把“占有史料”看作是史料工作的全过程,其方法统属考证。它包括搜集史料、比较史料和归纳史料。考证重在证据,只有证据确凿,才能成为定论。考证学切戒凭传闻、凭记忆、凭印象。

我和中国佛教考古学 宿白 56

佛教遗迹以建筑构造的不同,可分寺院遗迹和石窟寺遗迹;以地区和派系分,主要是汉地佛教遗迹和藏传佛教遗迹。“文化大革命”前我着重的是汉地的寺院遗迹;“文革”后,逐渐扩展重点范围,既包括了石窟寺,又包括了藏传佛教遗迹,因而产生了应当考虑较全面、较有系统的中国佛教考古学的想法。

我和中国文学史 吴小如 65

讲中国文学史不能忽视文字声韵训诂方面的基本知识。如果缺少这方面的知识,至少对古代文学作品不能做到正确而深透的理解;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与科研不能像“铁路警察”那样“各管一段”,做为教师或科研工作者,不宜局限于自己所侧重的那一小块学术领域,而应胸有全局;同样,也不能“包产到户”,只管自己所研究的这一“块”而忽视另外几“块”的内容。这就是我在教学实践和学术研究中一直恪守的准则。

我和音韵学研究 邵荣芬 74

做研究工作首先碰到的就是选题问题。我认为在一般情

况下,应该选择所攻学科的根题,也就是关键性的有生长能力的课题。从汉语音韵学来说,《切韵》音系应该就是这样的根题。《切韵》音系是现存一千多年前一个完整的汉语音系材料,一般都根据它上推上古音,下连近现代音。故此对《切韵》音系认识得正确与否,就成了能否正确认识上古音和近现代音的关键。可见,对《切韵》音系的研究,具有带动全局的作用,拿它作为首选之题,当是最佳选择。我就是这样做的。

我和古典目录学 来新夏 90

我真正入门于目录学的研究领域是在 50 年代中期。我在教学与科研工作中常常见到人们为了论史证史,而需从浩繁的史籍中搜集资料,往往都是人自为政,穷年累月,孜孜不倦地去翻检爬梳时,我就想为什么不可以把大量史籍分门别类地查清底数,编纂目录备用,免去人人从头做起呢?于是,我即着手以已有的目录学知识编撰一部有清以来的人物年谱目录,即后来出版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

我和中西交通史 龚方震 106

中西交通史的领域很广,注意到中亚一段的学者还不多,也许语言学是个难关,除了英语、日语外,还须通晓俄语、德语、法语,这些还只是基本要求。古代中亚的语言复杂,有古叙利亚语、突厥语、伊朗语、粟特语、吐火罗语、大夏语等,如不略具这些方面的基础知识,只能根据他人的二、三手资料稍事演绎,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我和小说戏曲 徐朔方 116

中国的古代小说戏曲和西方不同,有它独特的成长发展的历史。它的特点之一是小说和戏曲同生共长,彼此依托,关

系密切。因为相当多的作品都在书会才人、说唱艺人和民间无名作家,在世代流传之后,才最终写成。它们是不同的世代的作者在承续不断的流传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集体创作。这是我对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宏观理解。

我与《红楼梦》 冯其庸 132

我最初接触《红楼梦》是1943年我读无锡工专高中一年级时。1948年我转到上海无锡国专分校,在课堂上正式听讲《红楼梦》。1954年我到北京后,正碰上批判胡适、俞平伯先生的运动,我才开始认真读《红楼梦》。“文革”中,我的《红楼梦》被人抄家时抄走,我生怕这一阵风刮向全国,会把这部巨著毁了,于是每天夜深人定之后,用毛笔据影印庚辰本《石头记》,依原著行款朱墨两色抄写,整整抄了一年,是我真正深入《红楼梦》的过程。

我与拓跋历史研究 田余庆 171

我抓住“子贵母死”制度问题来研究,只是想找到这一奇特制度的来龙去脉,这肯定会对拓跋历史的认识有所帮助。道武帝如果靠后族支撑自己的部落联盟领袖地位,是可以办到的;但是要靠它树立一种超越一切之上的专制君权,却是办不到。他必须有一个集中权力的过程,其中包括剥夺母后和母族权力,特别是母族干预拓跋事务的权力。我觉得探索子贵母死制度的实质和渊源,钥匙就在这里。

我与唐传奇研究 卞孝萱 190

“五四”以来,对唐传奇的研究,主要是:考证作者生平、写作年代;进行分类;探讨思想性与艺术性;进行注释、辑佚、赏析等。我另辟蹊径,以小说写作的政治背景为出发点,从传奇

作者的政治态度入手,专与通结合,文与史互证,旁推曲譬,以意逆志,透过表面的藻绘,进入作者的心胸,探索作者的创作意图亦即作品的真正寓意。

我与北京历史民俗 邓云乡 210

我不是北京人,也不是北京出生的外省人,虽然老辈几代都在北京生活过,可是我童年一直在乡间山镇。我时常想:也许我如果出生在北京,从小北京长大,或许对北京没有那种较新鲜深刻的认识与爱好,也不会对北京历史风俗那样感兴趣,去注意观察、欣赏理解它……

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 黄永年 222

我的研究为什么不从中唐以后往下推而倒过来上溯齐周杨隋,自然是考虑到有些唐代的事情不上溯弄不清楚。但还有个偶然的因素,即其时高校古委会组织人员编写一套《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我建议“二十四史”也得译全,结果《北齐书》、《周书》的选译落到我的头上。既要选译,就得认真读一遍。谁知一读就读出了问题,促使我把兴趣和精力上移到这齐周杨隋上面。

我和中日关系史 张振鹞 237

1982年,日本发生教科书事件,日本应如何正确对待历史上的对外侵略的问题,引起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人们渴望了解长期以来日本侵略的真实情况。为适应此一需要,近代史所决定编写一部简明的日本侵华史,这一任务由我所在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一室承担,我是该室的主任,主持编写该书的担子便落在我的肩上。我开始以主要力量对中日关系史进行专门的、比较系统的研究。